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 主办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海洋史研究

【第十五辑】

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 Vol.1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
成立十周年纪念专辑

李庆新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7~8世纪东南亚倚坐佛像起源 与传播研究新视野

尼古拉斯·雷维尔（Nicolas Revire）*

倚坐佛像（Skt. bhadrāsana）^① 频繁出现于公元1千纪亚洲佛教造像中。其主要有两种手势，单手说法印（vitarkamudrā），或是双手说法印的变体手势——转法轮印（dharmacakramudrā or dharmacakrapra-vartanamudrā）。有这类手印的造像在亚洲佛教中的传播是不均衡的。虽然这种坐姿和说法印的组合经常出现在大陆、东南亚海域以及中亚和东亚，但在印度次大陆却是极其罕见的。相反，与转法轮印的组合多出现在南亚及东南亚海域北部，而在东南亚大陆和东亚都没有发现。

本文主要研究施说法印的倚坐佛像，试图将其起源与印度某一重要佛像联系起来。^② 在考察南亚以外不同地区发现的这一图像时，笔者探讨唐朝时期（618~907）中亚与东亚模式在其向东南亚传播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7~8世纪，东南亚的本土风格似乎并没有很强的影响力，至少不足以抵挡新模式带来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在唐朝和丝绸之路上寻找一种

* 作者尼古拉斯·雷维尔（Nicolas Revire），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教授；译者冯筱媛，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① 学者们曾将这种坐姿称为“欧式坐姿”或倚坐。出于多种原因，这两个术语都不尽如人意，并受到了批评。

② 本文并非致力于辨认佛像，而是通过充足的文献、碑铭、考古学等证据，将一种手印与倚坐佛联系起来以确定佛像的身份（释迦牟尼、弥勒佛、毗卢遮那佛等）。

可能的施说法印倚坐佛的原型，或者更准确地说，寻找到一个“缺环”来解释它随后在东南亚造像中的发展。

一 东南亚一种特殊但广泛分布的图像



图1 坐佛，石质，高55厘米，7世纪晚期越南河静出，现藏于越南胡志明市历史博物馆

越南南部茶荣省（trà Vinh）河静（Sòn tho）的垂脚佛像可能是这类造像在东南亚最早的发现之一，可追溯至公元6~7世纪。^①图1这座小石佛像与泰国中部发现的佛像在风格和图案上都有一些相似之处。^②虽然右臂已残损，但它一定是举起施说法印或是无畏印（abhayamudrā）。相反，位置较低的左手自然置于大腿上，似乎握着佛衣的下摆。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曾提出，这种不同寻常的手印，不符合印度的传统风格。

这些手印与姿势是从何处得到灵感的呢？南希·廷利（Nancy Tingley）提及这样一条史料：中国僧人玄奘在645年从印度西行返回长安（西安）后，制作了一批造型各异的佛像，其中一尊便是垂脚坐佛像。她进

而提出这种特殊的姿势（倚坐姿）可能受到玄奘在印度所见的一种“令人敬畏的佛像”的影响；或者可能表示“佛陀一生中的某个特定时间”。^③将这些

① 最新的出处为越南茶荣省 Vinh loi (N. Tingley, Catalogue entries; The Archaeology of Fu Nan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the Oc Eo Culture of Viet Nam, in N. Tingley, ed., *Arts of Ancient Viet Nam: From River Plain to Open Se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8 - 149), 但笔者相信路易斯·马利雷特 (Louis Malleret) 所依据的法文数据更为准确。

② P. Dupont, *L'archéologie mène de Dvāravatī*. Paris: Publica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41, 2 vols., 1959, p. 279; N. Revire,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bouddhas en pralambapādāsana dans l'art de Dvāravatī: le cas du Wat Phra Men - Nakhon Pathom*.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2 vols., University of Paris: Paris 3 - Sorbonne nouvelle, 2008, p. 100.

③ N. Tingley, Catalogue entries; The Archaeology of Fu Nan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the Oc Eo Culture of Viet Nam, p. 148.

与中国、玄奘试探性地联系在一起是十分有趣的，下文也将有所提及。但遗憾的是，在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再未发现其他可与之相比较的完整佛像。^①

然而，这种垂脚坐佛像在泰国中部的一些古代遗址中多被发现，有石质、青铜质、陶质、灰泥质和浅浮雕等。^② 也许突出的例子是在佛统府普拉门寺（Wat Phra Men）发现的几座大型石佛像。所有这些佛像均为右手上举施说法印，只有位于今大城府那普拉门寺（Wat Na Phra）的一尊佛像是双手置于膝盖上。^③ 总之，双手施印的佛像在印度艺术中十分少见，甚至完全不存在。下文笔者会说明，这种手印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唐代早期、日本白凤文化或奈良时期（645~794）更为普遍。^④

至于浮雕，大部分是关于佛陀对众生、众神甚至是他的母亲说法的故事。苏泰寺（Wat Suthat）石板有趣地记载了这些。这块石板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分描绘了舍卫城神变（the great Miracle at Śrāvastī）；上部分则是佛陀上升忉利天（trāyastriṃśa heaven）后坐在帝释的宝座上为他的母亲和众神说法的场景。^⑤ 图2由于石板上的明显分隔，为研究者们猜测这两个场景提

- ① 在老挝南部瓦普寺（Wat Phu）遗址附近发现有类似的坐佛像残片，目前已刊布。此外，其他一些类似的残片在20世纪消失不见。如杜邦曾描述过在柬埔寨金边发现的垂脚坐佛像，但记录丢失。彼得·斯基林（Peter Skilling）提及20世纪初，在越南广南省（Quảng Nam）发现有一尊很小的佛像（21厘米），背后题有“ye dharmā”，但很遗憾没有拍照，现在也无法追踪。另外，在最近一次北美展览中展出了一座非比寻常的倚坐佛像，但它确切的发现地点未知。这尊来自美国私人藏品的佛像，展现了堕罗钵底造像类型与湄公河三角洲艺术风格的有趣融合。
- ② N. Revire,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bouddhas en pralambapādāsana dans l'art de Dvāravatī: le cas du Wat Phra Men - Nakhon Pathom*, pp. 61 - 90; Baptiste, P. and Zéphir, T., ed., *Dvāravatī: aux sources du bouddhisme en Thaïlande*,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9, pp. 115, 212, 228, 230.
- ③ 这些精美的佛像在20世纪60年代被泰国美术部门重修，或者甚至早在19世纪就被当地居民重修。这些重修后的造像见于Dhanit Yupho（1967），所有的手部都非原件。然而，根据该地区其他造像来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说法印应当是右手施印。
- ④ O.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Reprint, 1st ed., 1925, 2 vols. Bangkok: Sdi Publication, 1998, pp. 38b, 254, 272, 290 - 291, 393a, 397, 380 - 381, 461, 486, 490, 493, 499, 514, 529a; D. Wong, ed., *The Hōryūji Reconsidered*.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p. 144, fig. 5, 13 and pls. 13, 16, 17.
- ⑤ 笔者自始至终使用梵文的术语，但在舍卫城神变的记载中出现了巴利文大藏经特有的芒果树。据上座部传统，佛陀在忉利天传布论藏。其他佛教传统隐约唤起了佛法的传教。夸里奇·威尔士（H. G. Quaritch）错误地识别了石板上部佛陀第一次布道的场景。P. Skilling, *Dharma, Dhāraṇī, Abhidharma, Avadāna: What was taught in Trayastriṃśa?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7*, 11 (2008), pp. 37 - 60.

供了极大空间。笔者在下文中将重新提及这一点，但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关于布道佛陀的两个画面都是垂脚坐姿，右手施相同的说法印。

在公元 1 千纪的缅甸，只有少数幸存的金属造像。这些造像让人想起堕罗钵底铜像，一种右手举起、倚坐姿的佛陀形象。^① 然而，最有趣的可与堕罗钵底造像对比的材料却并没有刊布。它是一件较小的青铜雕像，据说是由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位农民在缅甸敏建北部的萨梅肯（Sameikkon）发现的，现属于欧洲的一个私人藏品。这件铜像与另一件更早发现于泰国佛统府、现存于曼谷国家博物馆的造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② 虽然两座造像上的铜绿都已受损，但可以从另一件展出在泰国国家博物馆的完整铜像的比较中想象他们最初的样子（图 3）。杜邦因佛陀独特的头饰和“海龙”饰宝座上的两



图 2 舍卫城神变（上部）；忉利天说法（下部），石板浮雕，高 200 厘米，宽 90 厘米，公元 7~8 世纪泰国中部佛统府出，雷维尔拍摄



图 3 铜质坐佛，高约 15 厘米，公元 7~8 世纪泰国中部信武里府出，泰国国家博物馆藏，雷维尔拍摄

① G. H. Luce, *Phases of Pre - Pagan Burma, Language and History*,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i: fig. 76b; E. H. Moore, *Early Landscapes of Myanmar*, Bangkok: River Books, 2007, pp. 20 - 21, 164, 222.

② P. Dupont, *L'archéologie mène de Dvāravātī*, Paris: Publica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41, 2 vols., 1959, pig. 502.

只直立狮子等特征将这一佛像归于晚期。^① 依据杜邦的说法，在古缅甸和古泰国的很多地方发现有倚坐佛像，他们既非孟（Mon）也非骠（Pyu）的起源，却明显表现出东南亚的“区域性”特征。^② 正如下文所见，在这两个地区及周边，均发现有这种类型的泥板。

在古代印度尼西亚，公元1千纪倚坐佛造像的考古材料更为丰富。大体来说，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本文主要涉及的对象，即右手说法印的佛像。已有许多众所周知的青铜佛像，但至少有一件来自爪哇中部的石佛像似乎也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种类型是两只手表现变体转法轮印，如一尊供奉在门杜（Mend）寺的青铜佛像及一尊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小青铜佛像（图4）。笔者认为，后来造像的艺术灵感几乎来自阿旃陀（Ajanṭā）、埃洛拉（Ellorā）、坎赫里（Kaṇherī）和马哈拉施特拉邦（Mahārāṣṭra）境内德干高原西部石窟群的犍萨罗类型（Vākāṭaka）。因此认为，爪哇艺术与那烂陀或比哈尔的其他波罗时期遗址存在直接联系，特别是在青铜冶铸方面，但在倚坐佛像方面仍不太确定。

从年代学角度讲，出于多种原因，笔者倾向于第一种类型的造像年代早于第二种类型。笔者的主要论点基于倚坐佛像的不同手印和特定宝座样式的出现。这些将会帮助我们缩小到一个可能的年代范围。海勒姆·伍德沃德（Hiram Woodward）明确提出诸如在巨港发现、现藏于阿姆斯特丹类似的青铜佛像^③的



图4 铜质坐佛，高11.5厘米，公元8~9世纪爪哇中部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雷维尔拍摄

① P. Dupont, *L'archéologie mène de Dvāravātī*, p. 278.

② 如图4所示的“海龙”饰宝座与藏于爪哇梭罗拉迪亚·普斯塔卡（Radya Pustaka）博物馆的一件小青铜佛像相似。扬·方丹（Jan Fotein）认为，爪哇出的这件青铜残片模仿的原型可能来自南印度。

③ 这尊佛像藏于阿姆斯特丹热带博物馆，相关信息可查阅网址：<http://collectie.tropenmuseum.nl>。

年代为7世纪晚期或8世纪前半叶。海勒姆·伍德沃德还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往西方朝圣的僧人，如7世纪的义净及其他游历南海的僧人似乎影响了东南亚佛教造像的形成。正如下文所讨论的，基于对中国材料的比较分析，笔者倾向于这一观点和断代。^①

相反，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倚坐佛像的年代是8世纪末9世纪初，至10世纪，这种特殊的造型在古代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已不再流行。^②但12~13世纪，这种造型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出现，最早出现在缅甸，继而出现在泰国艺术中，用以赞颂在波陀林供奉佛陀的猴子和大象。

在泰国中部及半岛、缅甸、爪哇西部、坎帕等地发现的数量相当，造型相同的模制有右手上举的倚坐佛像泥板，反映了7~8世纪东南亚交通与交流的复杂状况。这些泥板看起来属于东南亚的“地域类型”。但不能确定它们与典型的“孟”（Mon）、“骠”（pyu）、“马来”（Malay）、“爪哇”（Javanese）或“占”（Cham）类型有关。因此，重新审视中国唐代，或大约7世纪日本的一些表现中央主位佛像的小泥质陶塑显得尤为重要。^③这些广泛分布的模塑，为艺术传承及东南亚同周边地区陆路、海路多种接触提供了鲜明的依据。

二 唐代繁荣及其与东南亚的交流

上述东南亚的考古证据及其与一些东亚材料的明显联系，让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右手施说法印的倚坐佛像如何传至东南亚，特别是在7~8世纪的墮罗钵底和爪哇艺术中为何如此流行此类造像。鉴于这一时期佛教在亚洲的背景以及中国唐王朝的影响和声望，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当时“世界性佛教艺术类型”的一部分，沿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传播而来。正如王静芬所述：

① 虽然公元1千纪东南亚没有确切纪年的造像，但中国的一些造像可依题记断代，这为东南亚类似的佛教造像断代提供了相对的年代标尺。

② 现存于越南中部同阳（Đồng Dương）的造像是公元1千纪最晚出现的这类造像（875年）。这里发现的石质倚坐佛像（现藏于占族雕塑博物馆）明显受到中国唐代佛教艺术的影响。在中国甘肃、宁夏、四川等地亦可见相同姿势的大型佛像。

③ Yoko Shirai, *Senbutsu: Figured Clay Tiles, Buddhis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on the Japanese Islands, ca. 650 CE - 794 CE*, Thesis (Ph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 111.

7世纪,唐朝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际帝国,并在8世纪前半叶达到鼎盛。唐太宗时(626~649)大败西突厥,使中国在通往西方的陆路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最著名的是游历印度十六年,被后世颂扬的中国僧人和翻译家玄奘(602~664),他于645年返回长安,标志着唐代国际化的新阶段。……玄奘和王玄策^①等携回的佛像、图像抄本和碑铭草图,带来了新的视觉来源和刺激,在唐朝都城掀起一股“印度热”。这些国际化和印度化的特征在长安和洛阳的造像艺术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都城的外国艺术家促进了这种国际趋势的发展。一些印度和中亚艺术家的后裔长期旅居中国,继续活跃在唐王朝。^②

在唐代的都城是否还居住着一部分“昆仑人”?^③正史中没有关于东南亚艺术家来中国的记载。然而,在唐初曾有多达20个东南亚国家派遣使团前往中国。拉尔夫·史密斯(Ralph Smith)提出,“唐王朝的繁盛与声望已远播东南亚大陆腹地”。在7世纪上半叶的唐代编年史料记载的多个“王国”中,堕罗钵底分别于638年、640年、649年三次派遣“使团”来华,之后则不见记载。这些官方使节极有可能是乘坐载有商人、匠人、僧侣的商船前往中国的。一些日本学者根据8世纪初编纂的《日本书纪》甚至推测“堕罗钵底人”或“昆仑人”在7世纪中叶已远行至古代日本。^④650~750年,即唐王朝的全盛时期,仍

① 王玄策曾作为使节出使印度三次或四次,开辟了从中国西藏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的新路线。在西藏和龙门石窟都发现了与王玄策有关的题记和图像。

② Dorothy Wong, ed., *The Hōryūji Reconsidered*.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p. 132 - 133.

③ 在这一时期,中文史料将东南亚的居民称为“昆仑人”。他们常被描述为毛发卷曲、肤黑的形象。参见如沙畹、高楠顺次郎、伯希和的研究。

④ 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将来自“吐火罗”的人暂定为“堕罗钵底人”。参见 Tatsuro Yamamoto, “East Asia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Dvaravati Stud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Conference*, 22 - 26 Aug. 1977, Vol. 2,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47 - 1148; Shōji Itō, *Dvāravatī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of Japan*. A Paper submit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Conference, 20 - 24 May 1996,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996. 然而,吐火罗更有可能与中亚吐火罗或粟特人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关于联系中国与印度海上航线之粟特商人的研究可参见 F. Grenet, “Marchands Sogdiens dans les Mers du Sud à l'époque préislamique,” *Cahiers d'Asie centrale*, Vol. 1, No. 2 (1996), pp. 65 - 84. 在泰国中部的枯磨郡和乌通郡都发现有粟特商人的陶质和灰泥质遗物。参见 Baptiste and Zéphir, *Dvāravatī: aux sources du bouddhisme en Thaïlande*,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9, p. 184, fig. 79; pp. 204 - 205, figs. 99 - 100.

不断有使团从东南亚、南亚（如真腊、三佛齐等）被派遣至中国。

这一时期，中国僧人对印度佛教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因此，作为海上贸易目的地或中转站的东南亚，其重要性显著提高。自645年玄奘返回中国，其他僧人和朝圣者也效仿其踏上前往印度的西行征程。玄奘及他之前的法显^①、宋云等先贤，都选择了“陆上丝绸之路”。然而，吐蕃势力的崛起和阿拉伯人对大夏国的威胁导致中亚陷入政治混乱，致使通往印度的“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因此，在7世纪下半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印度与中国宗教交流、货物流通、人员往来的重要路径。^②

义净（635~713）是最著名的乘船经南海路线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671年他乘商船从广州出发，随后在东南亚的巨港、南苏门答腊居住了几年。据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有37名朝圣僧人在他之前或同时乘商船经过这些地方，有时甚至需要在此停留一段时间以等候季风。^③另外的文献还记载了一些中国僧人冒险走人迹罕至的道路而进入东南亚腹地。义净曾提到僧人大乘灯儿时随父母泛舶往堕罗钵底国，后前往印度，但其后再无记载。在西贴（Si Thep）发现的两块泥板上记录了另一位前往东南亚大陆更北地方的中国僧人，^④其上有四个汉字“比丘文相”，“文

① 法显于399年经陆路到达印度，413~414年经海路返回中国。

② 在8世纪末的晚唐文献中可以找到这条海上航线的历史记载。伯希和对这条航线的记载做了详细的翻译与注释，P.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4 (1904), pp. 215-363, 372-373.

③ 这些地区主要在室利佛逝国或其周边国家。参见 E. Chavannes, trans.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 - Tsing*, Paris: Ernest Leroux, 1894, pp. 36, 42, 53, 60, 62, 64, 77, 100, 126, 136, 144, 158-159, 189-190。这些国家的具体位置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可参见 L. C. Damais, “Études sino-indonésiennes: III La transcription chinoise Ho-ling comme désignation de Jav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52, No. 1 (1964), pp. 93-141; W. J. Meulen, van der. in Search of “Ho-Ling”, *Indonesia*, Vol. 23 (1977), pp. 86-111; Jordaán, R. E. and B. E. Colless, *The Māharājas of the Isles: The Śailendras and the Problem of Śrīvijaya*, Leiden: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2009。虽然米歇尔·雅克-赫尔古尔 (Michel Jacq-Hergoualc'h) 认为“这些僧侣似乎都没有考虑过穿越马来半岛到达东南亚”，但义净的记载还是暗示了这条环半岛路线的存在——旅行者需要在“郎伽戎”或狼牙修（今 Yarang，也兰县，泰国南部北大年府）和“羯荼”（可能是吉打州）停留。

④ 这位僧人可能从内陆的另一路线，即从越南海岸出发，经瞻波 (Campā) 最终到达“文单”或陆真腊。参见 P.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4 (1904), pp. 211-215, 372。一些学者试图在泰国东北部的某个地方找到“Wendan”这一地点。

相”应该是这位僧人的名字。伍德沃德 (Woodward) 根据文体将泥板断定为公元 8 世纪, 泥文应该属同一时期。

同时, 印度的一些僧人也通过海路前往中国。僧人善无畏 (Śubhakarasiṃha, 637 ~ 735)、金刚智 (Vajrabodhi, 671 ~ 741)、不空 (amoghavajra, 705 ~ 774) 是在唐代传布密宗最具影响力的三位“胡僧”, 他们都从南海到达广州。在他们之前, 即 7 世纪下半叶, 也曾有僧人那提 (Puṇ yodaya, 生卒不详) 在真腊、中国等地云游。还有一个关于南印度婆罗门僧菩提仙那的著名例子, 他于 736 年到达日本, 752 年主持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开眼仪式。^①

7~8 世纪, 佛教僧侣通过海路在印度与东亚之间进行广泛交流, 并在东南亚做短暂停留,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朝圣僧人会随身携带一些小型佛像、宗教仪式器具^②、布画、图纸及佛经文书等^③。遗憾的是, 经过沧桑岁月, 在东南亚并没有发现这些物品。而诸如模制泥板、小铜像、木制品、刺绣或绢画^④、棕榈叶等因其便于运输, 被认为是新造像传播的最佳媒介。^⑤

-
- ① 中国僧人鉴真 (688 ~ 763) 在经过五次跨海失败后于 745 年抵达日本, 被视为佛教东传日本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鉴真第五次东渡时, 信徒中有一位“昆仑国”僧人军法力, 极有可能是来自东南亚。参见 M. A. Bingenheimer, Translation of the Tōdaiwajō tōseiden 唐大和上东征传 (Part 2), *The Indi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5 (2004), p. 161, fn. 50。
- ② 在泰国佛统有一个铜质锡杖杖头, 其他公元 1 千纪的遗物在爪哇也有所发现。这是否能成为该地区朝圣僧交流的部分证据?
- ③ 7 世纪, 中国已出现雕版印刷和在纸或丝绸上冲压图像的尝试。义净也提到了印度的“纸”, 并证明了这种印刷形式, 参见 T. H. Barrett, “Did I - Ching Go to India? Problems in Using I - Ching as a Source on South Asian Buddhism,” in P. Williams, ed., *Buddhism in China, East Asia, and Japan*,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2 - 3, 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15, 2, 1998, pp. 142 - 156]。
- ④ 在爪哇中部的塞武寺 (又译色乌寺, Caṇḍi Sèwu)、普拉桑寺 (Caṇḍi Plassan) 和普兰巴南 (Prambanan) 墙壁上绘有中国丝织物上的基本图案, 参见 H. W. Woodward, “Jr. A Chinese Silk Depicted at Caṇḍi Sèwu,” in K. L. Hutterer, ed., *Economic Exchan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s from Prehistory,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Ann Arbor: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7, pp. 233 - 243。
- ⑤ 安杰拉·霍华德 (Angela Howard) 甚至认为早在 5~6 世纪, 海路已对印度美学与佛教艺术引入中国沿海起着重要作用, 并强调俄厄是当时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中心。因此, 她提到 519 年, 扶南国遣使向南朝梁国觐献檀木佛像, A. H. Howard, “Pluralism of Styles in Sixth-Century China: A Reaffirmation of Indian Models,” *Ars Orientalis*, Vol. 35 (2008), pp. 76 - 77。关于这些物品携带和流通的问题, 可参见 P. Skilling, “Paṭa (Phra bot): Buddhist Cloth Painting of Thailand,” in F. Lagarde and Chalermpon P. Koanantakool, eds., *Buddhist Legac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Mentalities, Interpretations and Practices*, Bangkok: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Anthropology Centre, 2006, p. 234。

然而，在东南亚并未发现公元1千纪遗留下来的壁画或是刺绣，因此，只能假设这种图像的传播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可以尝试根据一些东亚考古证据来解释堕罗钵底浮雕。以著名的佛统倚坐佛为例，其属浅浮雕，倚坐姿，右手上举施说法印，左手下垂置于大腿上，为面前的弟子说法（图5）。伍德沃德怀疑这座浮雕可能“受到中国画的影响，或中国朝圣僧将不可磨灭的印度模式带入了东南亚”。他尝试将这件特殊的浮雕与长安宝净寺浮雕（图6）、中国和日本版画、日本国宝刺绣制品中相似倚坐佛图像等材料联系在一起，认为“公元700年前后，中国在东南亚倚坐佛像的起源中发挥了某些作用”。^① 上述日本国宝刺绣制品由三个图像组合在一起，居中的佛陀同样是右手施说法印，坐于两只狮子支撑的宝座上，两侧各有六位较小的手中持花（花略有不同）的带头光侍从。在带头光神灵的上方，还有飞天在旋转如波涛的云层上飞舞，这一画面与佛统浮雕中弟子头上的云图相似。^② 一般将这幅刺绣认为是



图5 初转法轮图，石质浮雕，高60厘米，宽110厘米，
7~8世纪泰国中部佛统出，佛统大塔藏，
雷维尔拍摄

① 这件来自京都劝修寺的释迦牟尼说法图现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被认为是7世纪末8世纪初由唐朝带往日本，它的风格与法隆寺壁画非常接近，D. Wong, ed., *The Hōryūji Reconsidered*, pp. 144, 153, fig. 5. 13。丝质释迦牟尼说法图的相关信息可检索奈良国立博物馆主页 <http://www.narahaku.go.jp/english/collection/d-647-0-1.html>。总而言之，中国已断代的相同姿势的造像对东南亚材料的断代和比较研究有重要意义。

② 伍德沃德认为宝座上的云纹装饰并非出自堕罗钵底匠人之手，而是基于中国壁画做了抽象设计。



图6 坐佛，石质浅浮雕，高约120厘米，宽约80厘米，唐代（703~704），陕西西安宝净寺出，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藏，雷维尔拍摄

“释迦牟尼说法图”，但其他的解释似乎也合乎情理。^① 与之不同的是，佛统浮雕则被认为是初转法轮图像。

虽然佛统和奈良的这些相似特征十分引人注目，但这种造像模式是否直接从中国、日本传至堕罗钵底或邻近地区仍有待考证。^② 更为合理的推测应是，类似的佛教经文、传说故事、著作等同时影响了这些地区相关图像的广泛传播。优填王造佛陀像的故事是公元1世纪在中亚、东亚广泛流传的众多佛教传说之一。

- ① 《法华经》记有在灵鹫山或忉利天说法布道的无量寿佛或释迦牟尼，Yasuo Inamoto, “Aikuō zō tōden kō - Chūgoku sho - Tōki o chūshin ni [O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Buddha Image of King Udaya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ōhō Gakuhō* [*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69 (1997), pp. 409 - 411 [in Japanese]。彼得·沙罗克 (Peter Sharrock) 认为这可能代表弥勒佛垂脚坐于佛座上，与众菩萨一同建立和管理翅头末王都。
- ② 明确的证据是在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发现有中国青铜质小型佛像，L. Malleret, *L'Archéologie du Delta du Mékong. T. II : La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d'Oc - Éo*, Paris: Publica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43, 1960, ii, figs. 433 - 434。最近一次是在柬埔寨磅湛省发现，L. A. Cort, and P. Jett, eds., *Gods of Angkor: Bronz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ambodia*,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2010, figs. 16 - 17, 38 - 39。

三 理想模式：优填王（King Udayana）像？

在中国龙门石窟的几个小型窟龕中分布着一组特殊的佛像，与东南亚的材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佛像有汉字榜题“优填王像”。^① 据埃米·麦克奈尔（Amy McNair）报告的最新统计，龙门石窟约有 100 座优填王像，每座高约 1 米，根据榜题，年代在 655 ~ 680 年。^② 除了其上有令人信服的汉字榜题，龙门石窟的造像表现出强烈的印度风格，似乎可以从印度的一些地区中找到造像的原型。龙门石窟的这些佛像均为倚坐姿，右手上举，左手置于大腿上（图 7）。佛像均着贴身长袍，无褶，袒右肩——除了手势，这些都令人想起笈多时期的鹿野苑类型。^③ 佛像的头像面部饱满，肉髻很低，这些都具有更明显的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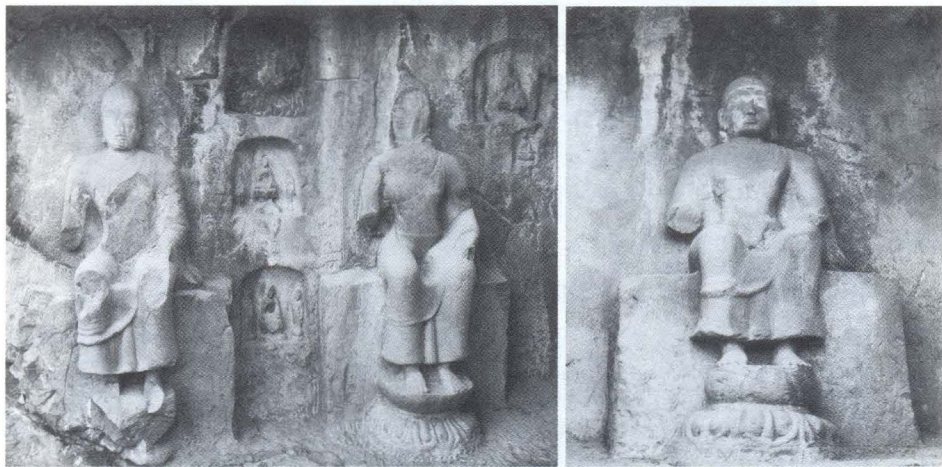


图 7 优填王像，高浮雕，高约 1 米，唐代（655 ~ 680 年），河南龙门石窟出，雷维尔拍摄

- ① 最早的题记写：“比丘□□为亡父母敬造优填王像一躯，法界共同斯福德。永徽六年十月十五日。”
- ② 现存可见的造像实际不超过 50 座。此外，大部分已从原来的壁龕中搬离或者已严重受损。另外，在河南巩县附近的石窟中也有 4 座类似榜题的佛像。
- ③ 大多数优填王像的手臂是残损的。但龙门石窟 440 窟佛像右手说法印，左手握佛衣下摆垂于左腿上，Yasuo Inamoto, *O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Buddha Image of King Udaya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p. 360, fig. 4; Tamami Hamada, “Chūgoku sho-tō jidai no lakuyō shūhen ni okeru uten ō zō nit suite [On the Image of King Udayana from around Luoyang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hina],” *Bukkyō geijutsu [Ars Buddhica]*, Vol. 287 (2006), pl. 4 [in Japanese]。尽管有这些重要的细节，但我们仍应注意到后期的修复。

印度特征。据此看来,这种特有的造像基本上反映了6~7世纪的印度传统,如现存柏林的一些图像材料(图1)。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不能确定龙门石窟这一组图像在印度有可能的来源区域。但由于这些造像几乎完全相同,这表明它们可能来自某一特定造像。

这些佛教造像因被称作“优填王”而颇受关注,这些可能与佛陀生前第一座栴檀像的传说故事有关,它是遵照一位虔诚国王的命令制作的,^①据说后来一件仿制品被带回中国。但是,最初的“优填王”像具体何样?最权威的是玄奘7世纪所撰《大唐西域记》中有关在印度北部的犍赏弥发现了优填王命令制作的释迦牟尼栴檀像的记载。他描写了栴檀像奇迹般的制作过程:

初,如来成正觉已,上升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不还,其王思慕,愿图形象,乃请尊者没特伽罗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宫,亲观妙相,雕刻旃檀。如来自天宫还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劳耶?开导末世,寔此谓冀。”^②

玄奘的记载清楚地表明,栴檀像最初便是坐像而非立像。法显在这之前已到过印度,虽然未至犍赏弥,但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该故事讲述的不是优填王,而是舍卫城波斯匿王。故事发生在祇园精舍,三个月后佛陀从忉利天回来,对栴檀像说:“还坐。吾般泥洹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③

① 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献记载,优填王可能皈依了佛教、耆那教或者印度教。

②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章巽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21页。关于玄奘在印度所见佛教造像参见 R. L. Brown, “Expected Miracles: The Unsurprisingly Miraculous Nature of Buddhist Images and Relics,” in R. H. Davis, ed., *Images, Miracles, and Authority in Asian Religious Tradi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p. 26-27。

③ 法显:《高僧法显传》,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第860页中。有关第一座栴檀像传说的其他资料,参见 P. Demiéville, “Butsuzô,” in P. Demiéville, ed., *Hôbôg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Fascicule III: Bussokuseki - Chi*,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Maisonneuve, 1937, pp. 210-211; Soper, “A. C. 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Ascona: Artibus Asiae Supplementum*, Vol. 19 (1959), pp. 259-265, 以及 M. L. Carter, “The Mystery of the Udayana Buddha,” *Supplement to n. 64 Agli Annali*, Vol. 50, No. 3 (1990)。现藏于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的一件犍陀罗浮雕,刻有一位皇室成员将一尊坐佛献给佛陀的场景, B. Rowland 解释为“优填王的礼物”, Rowland, B. Jr. A, “Note on the Invention of the Buddha Image,” (转下页注)

有关优填王像最终传到中国的古老传说多次出现。玄奘在书中写到他自己曾在 645 年回到长安时带回 7 座印度流行佛像的仿制品，据说其中第三件就是仿照栴檀像制作的。之后，优填王像必定在洛阳地区备受推崇，龙门的供养人必定也熟知这一传说。据此，一些中国和日本学者认为龙门石窟的造像可能仅仅是模仿了玄奘带回来的栴檀像。^① 一条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玄奘归来（645）与龙门石窟第一尊优填王像制作（655）的时间差。麦克奈尔（McNair）根据龙门石窟的各种榜题，推测应该是“一小群相关的人捐赠了大部分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而且，“由于这些人曾接触过这些佛像，因此他们对这些佛像特别感兴趣”。^② 她甚至推测这些人是玄奘的朋友、亲戚，或是与洛阳净土寺有关的僧人，因为玄奘曾在这里出家。

奇怪的是，另一件被称作“优填王类型”的是出自日本京都清凉寺的著名木质立像，它在造像上与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根本不同。^③ 但十分明确的是，这座著名的佛像传承了龙门造像重要的传统特征。龙门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来源于南亚北部模式的猜想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为平衡这一点，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到中亚或犍陀罗模式。^④ 中国西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一些壁画亦有这一特点。^⑤ 至少有一例木质倚坐佛，据说是出于克孜尔 76 窟，现存

（接上页注③）*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1, No. 1/2 (1948), pp. 183 - 184。而卡特（M. L. Carter）则认为这是“波斯匿王的礼物”，M. L. Carter, *The Mystery of the Udayana Buddha*, 1990, pp. 8, 24。曼谷苏泰寺石板描绘了佛陀舍卫城神变和切利天说法的相似场景。然而，根据所见佛陀在切利天说法的传说，没有看到优填王或波斯匿王造旃檀佛像的故事。这个传说在东南亚广为流传，尽管故事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暹罗版本参见 P. Skilling, *Dharma, Dhāraṇī, Abhidharma, Avadāna: What was taught in Trayastrim a*, p. 78。

- ① 近期，李桂贞（音译，Kwi Jeong lee）回顾了有关玄奘和龙门石窟群造像联系的各种假说。
- ② A. McNair, *Donors of Longmen: Faith, Politics, and Patronag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102 - 103.
- ③ 京都清凉寺佛像是日本僧人裔然于 985 年依中国南部的一尊佛像制作的，而中国的这尊佛像据说是仿照鸠摩罗什在 5 世纪早期带到中国的较早的优填王像制作的。关于旃檀佛像及版本，参见 A. Terentyev, *The Sandalwood Buddha of the King Udayana*, St. Petersburg: Narthang, 2010。
- ④ 有一点应该指出，这种垂脚姿势的最终起源似乎可以追溯到贵霜时期，当时国王的肖像即是这种坐姿。
- ⑤ 在勒科克的著作中，垂脚坐于佛座中间的被认为是摩诃迦叶而非佛陀，表现佛陀入灭后，于王舍城召开第一次经典集结的场景。

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①（图8）。这座木佛像的右手恰好残损，但手势应是无畏印或说法印；右肩也是袒露的。此类型的木质佛像可能不止这一座，它们很可能是这种特殊图像在当地的表演。^②然而，这一有趣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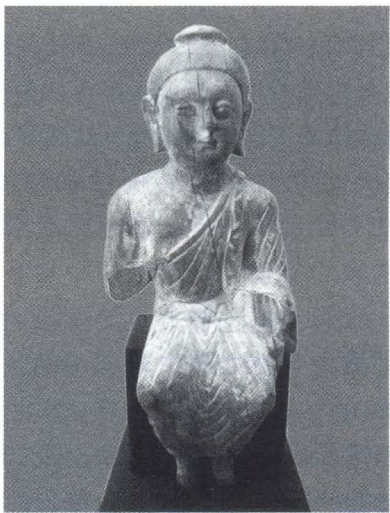


图8 木质坐佛，高12厘米，公元6~7世纪（?），中国新疆克孜尔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雷维尔拍摄

现在笔者想问的是，龙门石窟的这些造像是否传播到东南亚，并作为当地造像的范本？毫无疑问，龙门石窟所见的优填王像与“外来类

-
- ① Chhaya Bhattacharya, *Art from Central Asia (with reference to wooden objects from the Northern Silk Route)*, Delhi: Agam Prakashan, 1977, pp. 57-58, fig. 26; Härtel, H. and Yaldiz, M.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2, pp. 118-119, fig. 52; M.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2,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2, pp. 694-695, fig. 4. 69b.
- ② 丽艾 (Rhie) 还提到其他垂脚坐姿的木质佛像：一件出自和田，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出自库车，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
- ③ 更好地讨论东南亚艺术中“缺少木质造像理论”与贝尼斯蒂 (Bénisti) 的“可移动文物理论”，可参见布朗 (Brown) 的研究 (R. L. Brown, *The Dhāraṇī Wheels of the Law and the Indianization of South East Asia*, Leiden: Brill, 1996, pp. 190-192)。据布朗所言，“缺少木质造像理论特别吸引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在印度和东南亚，它允许共享的艺术模式带来的平行艺术的发展。在两种传统中共享的早期木质模型已然消失，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与之相仿的独立、耐久的材料。这解释为什么我们有共同的‘类型’，又有细节的差异”。

型”有关。^① 玛丽琳·丽艾（Marrylin Rhie）认为龙门石窟优填王像模仿东南亚造像多于印度类型，她写道：“虽然这些佛教造像类型最终来源于鹿野苑类型，但具体细节似乎更接近公元6~7世纪东南亚造像中的鹿野苑类型。”^② 不可否认，越南南部河静的石佛像（图1）、泰国中部所见小型铜佛像（图4）及相关的一些图像^③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手印或僧侣衣饰褶皱的问题时。丽艾进一步认为脚踩莲花座是另一个共同特征。不过，从图像与风格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河静倚坐佛的年代应该与优填王像的年代相近，约为7世纪下半叶，这明显比之前的推测晚得多。

此外，龙门石窟的一些造像中有一种轻微刻入墙面的高背椅图像。这种顶部呈扇形的座在唐代佛像中十分普遍，通常佛像是垂脚坐姿。这种座在奈良刺绣佛像和敦煌隋代405窟壁画中均有发现。然而，隋代的例子是6世纪晚期到7世纪早期，明显早于龙门。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基座装饰来自“陆上丝绸之路”而非海路。同样，一种类似的被伍德沃德称为“瓣形座背”的样式出现在7~8世纪的一些东南亚图像中，如来自巨港的小型铜佛像，以及婆罗洲三发（Sambas）发现的图像。这种几乎同时发生的趋势揭示了艺术风格和特定图案如何快速地从丝绸之路的一端传播至另一端。

结 论

本文初步探讨了施说法印倚坐佛像在东南亚的起源与传播，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研究较少的互动领域，特别是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相互影响。初步研究表明这种新的造像于7~8世纪出现在东南亚地区，极有可能与早期唐代模式有关，至少应该是相似的印度来源同时分别传至东南亚与

① “倚像”通常指“依靠”或“倚靠”椅子。在晚期中国佛教术语中，“倚像”指倚坐，或善跏趺坐。

② M. Rhi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the Art of Ind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618 - 755 A. D.*, Naples: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88, p. 42.

③ 布拉达帕迪亚·帕尔（Pratapaditya Pal）刊布的一件铜像即是这样一个例子。现由某私人收藏，据说出自乌通，具体地点不明，参见 Thanphong Kridakorn, *Pramuan phap pratima [A Collection of Sculptures]*, Bangkok: Krom Sapsamit [in Thai and English], 1965, pl. 3.

中国。^①

在这一点上，东南亚可能的“原型”或稍晚发展的类型是龙门石窟神秘而短暂存在的优填王像，年代为 655~680 年。但是，这种优填王像的独特形式之后如何能够对东南亚倚坐佛像造像形式特别是堕罗钵底像产生强烈影响呢？很明显，龙门石窟的这组造像非中国传统，或多或少是对印度模式的自觉渲染。因此，这种“理想模式”极有可能是玄奘 645 年从印度带回来的造像之一。这一组造像中有一座被誉为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的复制品，也是佛教造像中最有名的一座。若如其所说，玄奘很可能被认为是印度著名佛像传统进入中国的主要传播者。此外，鉴于人们对进出印度的海上路线重新感兴趣，其他佛教僧侣和朝圣者可能随后在中国和东南亚传播这一造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跨文化、地域的角度看，可以肯定的是，东亚佛教造像为比较同类的东南亚造像提供了宝贵资源。它生动地记录了跨地域宗教和艺术的传承过程。如果我们接受以上所说，龙门石窟的优填王像可能是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一个有趣的“中介模式”。或者，东南亚、龙门石窟的这组佛教造像能够反映出印度在公元 7 世纪中叶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在追溯这类佛教造像的印度根源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① 这一初步结论可能与其他常见结论背道而驰。如乔蒂玛·查图拉旺 (Chotima Chaturawong) 提到了印度和堕罗钵底造像的密切关系，但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材料。(“Indo-Thai Cultural Interaction: Buddha Images in Pralambapadasana,” in L. Ghosh, ed., *Connectivity & Beyond: Indo-Thai Relations Through Ages*,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2009, pp. 55-77.) 相反，李桂贞发现龙门石窟中优填王造像并非直接来源于“原始的”印度佛像，她观察到龙门石窟的优填王像与堕罗钵底的倚坐佛像有着很强的关联性。(Chodang gi uijwahyeong ujeon wang sang yeongu [A Study on the Udāyana Image in Pralambapadāsana of the Early Tang Period].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rt History [in Korean with English abstract], 2010.)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Bhadrāsana Buddhas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7th – 8th Centuries CE)

Nicolas Revire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eated Buddhas in the so-called “European fashion” (Skt. bhadrāsana), often found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7th – 8th centuries in Java, the Mekong Delta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art of Dvāravatī, one of Thailand’s oldest religious cultures. While dealing with stylistic and iconographic questions,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trace the origins of this specific posture, how it spread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examining its meanings. In doing so, I focus on the different areas of India, central Asia, China and Japa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My research tends to show that this iconographic trend is best affiliated with East Asian models during the early Tang period rather than with Gupta and post – Gupta images directly from India. Possible prototypes for later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are the “King Udayana statues” at the Longmen Caves dated by inscriptions from ca. 655 – 680.

Keywords: Images of Seated Buddhas with Legs Pendant; The “King Udayana” Image; Longmen Caves; Stylistic; Iconographic; Spread

(执行编辑: 徐素琴)